

## 社会思潮影响下国人近代体育观变迁研究

崔乐泉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北京 100061)

**【摘要】**:采用文献资料法,对近代不同社会思潮影响下国人体育观的变迁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运动、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兴起以及20世纪20~30年代出现的“土洋思想”交锋,伴以西方社会思潮而至的西方体育,在传播的同时亦对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国人体育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晚清时期,强兵、御侮和强种、强国的思潮,促使国人开始探讨体育救国之路;在军国民体育思潮的熏陶下,体育救国成为人们一种“理想化”的选择;而在民主与科学思潮激荡下蜂拥而至的实用主义体育与自然体育思潮、国粹主义体育与民族体育思潮,则使人们更加全方位地了解传统体育和西方体育,使人们从融健身、娱乐、竞技为一体的角度开始走向体育的真义与本质。这是中国体育在由传统向近代转变过程中国人体育观变迁的最主要特点,也是中国近代体育发展的主要特点。

**【关键词】**:体育观;军国民体育;民主与科学;实用主义体育;自然体育;国粹主义体育;民族体育

**【中图分类号】**: G8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909 (2018) 01-0049-13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进入了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期。面对现实,一批地主阶级政治家和思想家主张中国要效法西方,走近代化之路,并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继此而至的是包括社会思潮在内的西方资本主义“新学”逐渐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传播。而被视作“蛮夷小技”的西方现代体育,也在西方思潮的影响下,成为“西学东渐”文化碰撞中的重要对象,并引起了当时统治阶层、士大夫以及庶民阶层的关注。随着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运动、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以及20世纪20~30年代出现的“土洋思想”交锋,伴以西方社会思潮而至的西方体育,在传播的同时亦开始对国人的体育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和环境的影响,不同的社会思潮对国人体育观的影响是不同的,但体育观的变迁却始终与体育发展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交织在一起,这也是中国体育在由传统向近代转变过程中国人体育观变迁的最主要特点,也是中国近代体育发展的主要特点。

### 1 从强兵御侮到强种强国:晚清社会变革下的国人体育观

从1840年到1911年的晚清时期,西方现代体育开始逐渐传入中华大地。这一时期,列强对中国的一再侵扰,招致中国人的激烈反应,一大批具有爱国热忱的有识之士开始走上救亡之路。无论是洋务派领袖、资产阶级改良派,还是革命党的先知,其主张均充满着爱国主义情怀,其实践无不以爱国为起点,以救亡为鹄。来犯者是几千年未有之强敌,以文明著称的中国已无何种学问“适用于目前,而能救我四万万同胞急切之大祸也”。<sup>[1]</sup>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携长技东来的“来犯者”遂被

收稿日期:2017-12-17

作者简介:崔乐泉,研究员,博士,博导,上海体育学院特聘教授、滨州学院特聘教授,河洛学者,研究方向:体育史。

先进的中国人树作效法的榜样,并在救亡图存名义下走上了以强兵、御侮和强种、强国为主旨的发展道路。与此同时,被国人视作“救国之技”的体育也随着近代西方体育的传入和传播在发生着变化:中华民族固有的传统体育逐渐被“边缘化”,而近代西方体育则占据了我国体育的舞台。伴随着社会思潮影响而出现的这一体育主题地位的转换,无论对国人的体育观还是体育的发展无疑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 1.1 洋务思潮与强兵、御侮体育观

鸦片战争的后果之一,形成了先进的资本主义西方文明对落后的封建主义东方文明的冲击,并导致了两种文明不可避免的冲突。在这样的对峙中,中国的志士仁人开始在比较中鉴别与认知西方文化的长处和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短处,以此寻求救国的道理和途径。而晚清开始的近代体育的发生和初步发展过程,也始终是围绕着这一历史主题而展开的。

在中国近代体育史上,洋务运动在编练新军中引进西方兵式体操开始于 19 世纪 60 年代,其训练内容以洋操、洋枪、洋炮为主要形式。这可以说是中国人从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对西方现代体育的早期吸收和引进。

湘军、淮军、新建陆军、自强新军等新式军队最早开始引进了西洋兵操。如在曾国藩制定的湘军营规中,就有定名、演操、站墙子、巡更、放哨等等。曾国藩认为,军队只有每天不懈的操练,才能锻炼其体魄,娴熟其技艺。<sup>[2]</sup>淮军中,如 1866 年“淮军各劈山炮队,皆用开花炮。其抬枪、小枪队,皆改用洋枪。故所部陆军五万余人,约有洋枪三、四万杆。铜帽,月需千余万颗;粗细洋火药,月需十余万斤。又有开花炮队四营。”<sup>[3]</sup>这样的装备在当时的国内确实是独一无二的。在新建陆军中,主要是仿照德国和日本的陆军建制推行新的军事教育。如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就聘用了不少外国人担任教官,其中以德国教官最多。自强新军也是按德国军制分成十三个营。其中步兵八个营、马队两个营、炮队两个营、工程队一个营。张之洞曾聘 35 名德国军官为其训练新军。从而使西方的步阵操、水操、枪炮以及射击、打靶、夺旗赛步等活动得以推广和普及。可见,洋务运动的“练兵,是指使用西洋新式武器及与之相适应的一套洋式操练方法,它与八旗、绿营旧式训练有着明显的时代区别。”“清政府倡导练兵,不仅是军事上的一项革新,而且也应该说是洋务运动一个显著的标记。”<sup>[4]</sup>

在洋务思潮推动下,在军事学堂引进体育课也成为了一种时尚。1881 年李鸿章在其创办的天津水师学堂(北洋水师学堂)中首先引进了体育课。据《清续文献通考》记载,天津水师的学生除了被“授以英国语言,翻译文法……推步、测量、驾驶诸学”外,还要“授之枪,俾习步伐;树之桅,俾习升降”。<sup>[5]</sup>原天津水师学堂学生王恩溥在 1957 年的回忆录中讲到:“天津水师学堂的体育课内容,有击剑、刺棍、木棒、拳击、哑铃、足球、跳栏比赛、算术比赛、三足竞走、羹匙托物况走、跳远、跳高、爬桅等项。此外还有游泳、滑冰、平台、木马、单双杠及爬山运动等。只是还没有篮球、网球等活动”。<sup>[6]</sup>

由南洋大臣曾国荃于 1890 年在南京创办的江南水师学堂(也称南京水师学堂),其课程设置和教育上两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是在入学资格的审查中,有明确的身体条件要求:“气体结壮,身无隐疾”。第二是每日傍晚放学后,要求所有学生都必须到操场进行体育锻炼。关于江南水师学堂的办学成效,在 1892 年的《格致汇编》一书中,曾有以下一段记载:“水师学堂创仅二年,全藉英文习练,已得臻至此进境,实觉奇异,大堪嘉美”。并特别指出:学生们“或打靶、或爬桅、或跑阵、或练勇,各显技能,莫不便捷”。<sup>[7]</sup>

西方体育的传入和逐渐普及,在处于社会动荡的晚清社会引起了一股不小的波澜。强兵、御侮的思想被融进了体育发展之中,并促使产生了中国最初的近代体育观念。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

棠、张之洞等人代表的洋务派，尊“中体西用”为主旨，在编练新式军队、创办军事学堂、兴办军事国防工业和民族工业并对外选派留学生的同时，对引进包括西洋体操在内的西方现代体育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张之洞对此这样评说：“体操学，关衰旺，人人胜兵其国昌”。<sup>[8]</sup>说明洋务派接受西方体育的目的就在于强兵，且主要是以西方的兵式体操为主。但是，在洋务思潮影响下，西方的“兵式体操”被笼统地冠以了体育的名号，致使在中国人建立的朦胧的体育观念上，起始即被打上了浓厚的军事烙印。在此基础上，强兵、御侮的体育思想，于人们的头脑中不知不觉地形成了共鸣，并影响着后来体育的发展。

## 1.2 维新思潮与强种、强国体育观

在洋务运动发展的基础上，维新思潮的兴起进一步推动了近代西方体育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戊戌维新是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人士所发动的中国近代早期的一场政治改良运动，也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但就社会思潮发展的脉络来看，维新思潮与洋务思潮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维新思潮就是脱胎于洋务思潮。戊戌维新虽不过百日，其实际的改革非常有限，但其对西方现代体育思想和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却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在促使将军队中的西洋体操引进学校教育的同时，人们开始从德育、智育、体育三育并重的角度，讨论人才培养问题。使得近代中国人能够从体育观上认识和接受西方体育，使得近代体育由军事上的强兵作用上升为国家与民族长远利益上的强种、强国。

作为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早在1891年于广州长兴里创办的万木草堂就作过关于德、智、体三育并重的学校教育尝试。梁启超在《康有为传》中曾有着这样的描述：“其为教也，德育居十之七，智育居十之三，而体育亦特重焉。”对体育要求则主要是重视军事体操，注意学生的课外活动，并且规定“每间一日”，课以体操。<sup>[9]</sup>可见，康有为的体育观念亦被他的学生梁启超继承和发展。梁启超在其《中国之武士道》中主张，中国的学校教育应该是多彩的，少年儿童在学习之余，“或游苑圃以观生物，或习体操以强筋骨，或演音乐以调神魂。”<sup>[10]</sup>而中国教育的最终目标应该是培养具有“民德、民智、民力”的新民。面对中华民族的现状，面对整个社会羸弱的中国，他特别强调“学生必习体操，强其筋骨，而使人人可为兵也。”<sup>[11]</sup>

由“体操者，强体魄、实精神也”的角度出发，维新派第一次提出了要“研究体育之学”，主张西洋体操要在中国扩大实施范围。维新派这种符合当时社会变革要求的做法，被当时的社会先进分子普遍接受，以致当时的中国社会出现了“有志之士，乃汇集同志，聘请豪勇军师，以研究体育之学”的新景象。<sup>[12]</sup>

正是由于维新派的提倡，在晚清政府于1903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和1906年清廷学部通令中，明确了各学堂一律练习兵式体操的规定。将西洋体操引进学校体育的主张和实施，为当时的社会带来了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在全国出现了寺庙办学校也要开设体操课的现象。

在维新思潮的影响下，于开办的一些女子学校中的体育也获得了推广。当时教会办的一些女塾中，主要模仿西方学校的教育模式，在课程设置上既有发展智力的近代科学知识，亦有促进女子身心健康的舞蹈和游戏教育。如1844年在江苏镇江开办的女塾中，课程除了《圣经》《三字经》外，还增加了体操和游戏。在1898年5月由维新派人士上海电报局局长经元善创办的被誉为“中国女子学堂”的经正女塾，筹办伊始就确立了“以发展女子身心健康”为主旨的办学思想。主张学校设立体操是培体却病之要义，所以在听文诵读之外，又设体操之课。

1902年上海邑绅吴馨创办了一所风气开通并有较大社会影响的女子学校——务本女塾。学校同样亦将体操列为正课教学，而著名体育教育家徐一冰先生也曾在该校担任过体育教员。在上海女塾的带动下，南京、常州、广东等地也都陆续开办了一批女子学校。值得一提的是，由汤剑

娥等人于1908年在上海创办的中国女子体操学校,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培养女子体育专门人才的学校。而这就是在维新思潮影响下结出的女子体育教育的最大硕果。

从维新思潮到戊戌维新运动,由将西洋体操引进学校体育,到开办女子学校,促进女子体育发展,维新派人士不仅提出了对学生进行德、智、体多方面培养的主张,而且从强国强种的立场出发,提出了高度重视妇女儿童的健康建议。这些都深深地影响着人们在体育观上的变化,即体育不仅有军事上的强兵作用,更有在国家与民族长远利益上的强种、强国作用。在这种体育观的影响下,近代西方体育不断地由军队向学校、由学校向社会进行传播,从而将近代中国体育引向了全社会。

## 2 从军国民教育到军国民体育:理想化的“体育救国”观

中国近代社会的洋务思潮和维新思潮,是影响近代西方体育传入中国的最早思潮,它在引入、传播西方体育的同时影响着国人体育观的变迁,同时也直接影响着后来军国民教育思潮到军国民体育思想的形成。

始于19世纪德国的军国民教育思潮,是在“忠君”“爱国”“尚武”的旨趣下,通过“兵式体操”等手段对青少年进行强制的军事训练,进而达到为其对外侵略战争政策培养军事人才的目的。鉴于当时中国遭受列强欺凌与掠夺的现状,又适逢洋务思潮与维新思潮的启蒙教育,在客观上为军国民教育融入国人观念创造了条件。但“军国民教育”思潮被引进中国的初衷是抵御外侮、救亡图存,其目的与德国和日本“军国民教育”主旨是不同的。况且在当时民族危机极其危重的情形下,“中国之军国主义的教育,不但必要而且还要加紧。……应依此军国主义之铁血精神为原则。这种教育的内容,对外应以保障民族福利为前提,对内应以巩固民生基础为依归”。<sup>[13]</sup>军国民教育思潮的传入随逐渐在体育界得到了认同,由此演进而来的军国民体育思潮开始对人们产生深深地影响。

1902年,一批留日学生如蔡锷、蒋百里、铁生、飞生等人,先后在《新民丛报》《江苏》《浙江潮》等刊物上著文宣扬军国民体育,力主军人之知识、军人之精神、军人之本质,凡全国国民,皆亦具有之。而以范源濂、徐一冰为代表的近代教育家,为了达到抵御外侮、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目的,也积极提倡尚武,主张推行军国民体育。

早年留学日本的范源濂,其教育理念即力主培养学生和国民的尚武精神,积极推行军国民教育。在《今日世界大战中之我国教育》一文中,他从“日本之谋我及其对外也,常寓其意向于教育”的事实,指出“特值世界大战之今日,于吾所期养成国力之教育,实为最良之时机。”认为作为我国的学校教育,“择其要者言之,曰:明世界之大势,示科学之重要,振尚武之精神,阐爱国之真义是也。”<sup>[14]</sup>他同时指出,这种军国民教育制度,即使现在“我国虽未能遽行,他日要当行之。果尔,则执干戈以卫社稷,正吾辈人人之义务也。”只有努力营造出“思夫不武者,不足以为国民;不武者,不足以为男子”的整个社会氛围,国人的“尚武之念,自油然而生矣。”所以,“养勇励志,磨厉以须,正今日之所当有事者也。”<sup>[15]</sup>

作为中国体操学校创始人的徐一冰,亦将“增强中华民族体质,洗刷东亚病夫耻辱”作为自己创校的校训。他认为体育“是为强国之道,教育之本也”。<sup>[16]</sup>并提出了普及体育应成为一种国家行为的主张。但是,在认同军国民体育的同时,他并不同意“学校体操一科,竟以尚武为唯一之目的,以兵式为必要之教材”的做法。<sup>[17]</sup>为此他提出了“正当体育”一说。为了推行其“正当体育”,他向当时的政府提出了关于学校体育的六点建议:第一,小学校、中学校体操及游戏,亟宜统一教授;第二,学校体育,亟宜革除兵式教练一门;第三,高等小学、中学、师范,亟应添习本国技击一门;第四,宜由国立建设一体育专门学校以示模范;第五,各省宜由行政长官,置设学校体操视学官;第六,女子大、小学校体操游技科,必须延聘女子教员教授。<sup>[18]</sup>在当时能提出这样的认识,是难能可贵的。

军国民体育思潮的核心是把兵式体操作为体操教学的主要内容,把军国民体育教育的实施作为达到强民救国的目标。但是,仅仅通过军国民体育来实现“体育救国”只不过是一种理想化的“体育观”。其实,在军国民体育教育的实施过程中,兵操训练的机械、呆板和枯燥特点,已经严重影响了学生的健康成长。“人们更多的是借助体育带给人们身体上的、机能上的功效去判断、去鉴赏,从而失去了体育作为人性发展工具的功用。”<sup>[19]</sup>在军国民体育思潮的影响下,映入人们眼帘的多是“体育救国”“集中军训”“国术救国”等口号形式,而实质性的效果却难以见到。<sup>[20]</sup>1919年4月,在教育部调查会上,提出了“军国民教育一节于世界潮流容有不合”的意见,并确定体育应以“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为新的教育宗旨。随着后来1919年《改革学校体育案》、1922年“壬戌学制”和1923年《中小学课程纲要》等的颁布,军国民体育在学校体育中的影响力逐渐削弱。

发生于20世纪初期的“军国民体育”思潮,虽然源于德国军国民教育思潮尤其是一大批留日学生的影响,但也与洋务运动后人们逐渐形成的强兵、强种、强国的体育观念有关。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而言,尽管将军国民体育作为“体育救国”的良方实施而过于理想化,但军国民体育的推行,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改进了当时溃散的社会不良风气,引起了人们对国民体育的关注,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体育界尚武风气的形成。正如有的学者所分析的,“它唤起人们对身体本身的重视,尚武、立志、强身、报国、磨炼意志,在一定程度唤起人们重视体育,也促使体育的地位在学校教育中正式得以确立。”<sup>[21]</sup>

### 3 走向体育的真义与本质:融健身、娱乐、竞技一体的体育观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的战败和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大致从1915年开始,以军国民体育为标志的强兵、强种、强国体育观念开始受到挑战,军国民体育逐渐遭到怀疑,尤其是随着在上海举办的第二届远东运动会和教会学校体育活动的影 响,客观上促使国人的体育观逐渐由强兵、强种和强国向健身、娱乐与竞技转变,人们逐渐从体育的本质去定义体育和认识体育。而这一体育观的转变,同样是在不同社会思潮的影响下逐渐出现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民主与科学体育思潮、实用主义体育与自然体育思潮以及国粹主义体育思潮和民族体育思潮。

#### 3.1 民主与科学思潮激荡下的体育观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扬的两面旗帜,民主与科学被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先生并称为德、赛二先生。他在《新青年》6卷1号提出,为了民主与科学,不惜流血牺牲,“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治的压迫、社会的攻击和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sup>[22]</sup>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批时代精英,也从民主与科学的角度开始了对近代体育的重新认识 and 解读。

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袖,从对中国传统文化中轻视学校体育现象的反省出发,在1915年的《敬告青年》一文中提出了“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新思维。他认为“教育儿童直接的目的,是要寻种种机会,用种种方法,训练儿童心身各种感官。使各种感官及观察力、创造力、想象力、道德、情感等本能,渐渐的自由生长发育。”<sup>[23]</sup>为此,他对以往的军国民教育和学校体育中的兵式体操持反对态度,认为兵式体操属军国民教育思想,应少输入青年杀人的思想。他主张青年应该健壮活泼,有助于国民之进取、有为之培养。他提出“游戏、体操、手工、图画正是用做生长发育这些本能的工具。所以小学里的游戏、体操不专是发育体力的,兼且是发育各种器官、肢体之感觉神经,及运动神经反应的本能和道德情感。”<sup>[24]</sup>从而把体育和心理健康、道德情感教育糅合在了一起。

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曾在1922年发表《五一纪念日对于现在中国劳动节界的意见》一文,他认为“游玩不是奢侈的事,乃是必要的事。”这是因为它“可以苏慰工作的疲倦,可以免

除堕落的恶习，可恢复身体的健康、精神的畅旺，可以补少年时教育不足”。<sup>[25]</sup>在这篇政论文章中，他同样强烈地要求有关当局，能在工人们聚居的生活场所组织建设公园、运动场、俱乐部等设施，以为工人的业余文化体育活动提供条件。李大钊还从科学的角度、从中国文明属静的文明角度，提倡健康活动中的“动以养生”理念，这是其科学健身观的突出体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同志，也曾一度把目光放在“体育救国”之路上。他曾以“二十八画生”为笔名，于 1917 年发表了《体育之研究》一文。文中从近代科学的角度，阐述了体育的概念、作用、目的以及体育与德育、智育的关系。同时还对体育锻炼的原则和方法等问题作了详尽的讨论。文中指出，所谓“体育者，人类自养其生之道，使身体平均发达，而有规则次序之可言者也。”“故夫体育非他，养乎吾生、乐乎吾心而已。”毛泽东认为，体育具有“强筋骨、增知识、调感情、强意志”，使人“身心并完”的作用。国家提倡体育，从对个人来说，则可以“养生”，对国家来说，则可以“卫国”。<sup>[26]</sup>因此，毛泽东主张通过发展科学体育，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恽代英对体育的关注，更多地是站在学校如何关心全体学生的健康这一角度上。他在 1917 年发表的《学校体育之研究》一文指出，学校体育就是“保学生健康”，“应对于各学生，无论其体质强弱，平均加以注意。”而不是“除例行的体操外，毫不加以注意。而于其中有运动能力者，则注意特甚，以为不如此不足以使学校名誉飞扬。”为了从实践上真正做好学校体育的实效性，恽代英对当时的学校体育工作者提出了六点改革建议和措施，包括加授生理卫生学课程、定期对学生进行体格检查、增加学生体育锻炼时间、提倡在学校中多开展田径与球类活动、注意体育活动的安全、注意女生特点，等等。<sup>[27]</sup>

民主与科学思潮的影响和逐步渗透，为中国近代体育的现代化转型奠定了基础。体育不仅是一种比赛也应该是一种休闲和娱乐的认识，开始渗入国人的体育观。在当时落后的国情条件下，虽然仍有人继续关注体育的强兵、强种、强国作用，但健身、娱乐、竞技的体育观念开始确立。如 1920 年麦克乐在其《新体育观》中指出：就体育而言，“我们底宗旨，不能只讲运动，乃是利用运动，供给儿童一个境遇，激动各性，按阶级秩序来发展。使他在游戏的里边，得着良好的习惯，也可得着能力的经验，准备他的生活。”<sup>[28]</sup>与此同时，民主与科学思潮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体育基础学科理论的发展。当时，许多体育基础学科的理论著述，如《运动技术概要》（1917 年商务印书馆）、《中国体育史》（1919 年商务印书馆）、《健康学》（1921 年中华书局）、《运动生理》（1924 年商务印书馆）、《体育学》（1924 年中华书局）、《中国体育概论》（1926 年商务印书馆）、《运动与卫生》（1927 年中华书局）等先后付梓，标志着体育基础理论学科的新发展。在民主与科学思潮的影响下，学校体育在设置体操课程方面也开始吸取教会学校的普遍做法，普遍开展了广泛的课外体育活动，并将田径、球类等近代运动项目纳入其中。这样一来，学校体育由过去单纯的体操课开始向体操课加课外体育活动的形式（即所谓双轨制）过渡。在民主与科学思潮激荡下的新的体育观，于中国近代体育开始走上初步现代化的过程中得到了初步显现。

### 3.2 实用主义体育与自然体育思潮渗透下的国人体育观

随着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欧美各国“新教育”运动的兴起，一种被称为实用主义教育的思潮在美国出现，后经美国教育家、哲学家杜威的推广，实用主义思想和方法在美国乃至全世界都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而由此出现的“新体育”思想和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学说，则成为实用主义体育学派形成的基础。实用主义体育认为，通过身体活动进行的教育就是体育，而这种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其手段和方法所采用的运动方式更自然、自愿和活跃。实用主义体育的主张，对 20 世纪以来的学校体育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随着 1919 年 4 月 30 日杜威来华传播其实用主义教育观，继之而来的实用主义体育思潮，亦从民国时期开始传播和盛行，并对我国近代体育产生了广泛

而深刻的影响。

在杜威的推广普及下,其“教育即生活”等实用主义教育格言被人们广为传播,实用主义体育思潮影响日益广泛。当时中国文化界、教育界的许多名人成为了杜威实用主义体育思想的忠实拥趸,并对杜威实用主义体育思想的传播作出了贡献。

在实用主义体育思潮影响下,我国近代著名民族实业家和杰出教育家张謇,提出了德、智、体全面发展,培养“健全之国民”等教育思想与主张,他还在其创办的数百所各式学校中建有运动场。力主体育与其他学科并重,学校体育要开展各种球艺和武术比赛。<sup>[29]</sup>这对改变中国传统的“文弱”之风,养成广大民众尚武的精神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张謇不仅重视学校体育,也重视社会体育、军事体育、兵式体操。他的体育思想与当时的时代主题相契合,具有很高的现实性和历史意义。

中国现代教育的奠基人之一,杜威的中国学生胡适,既是杜威忠实的拥护者和支持者,更是其实用主义体育思想的传播者。胡适在体育上提倡现代科学精神,反对封建迷信色彩的观念和做法。由胡适参与起草,北洋政府教育部于1922年公布的《学校系统改革案》(即“壬戌学制”),就是其实用主义体育思想在我国和学校制度改革上的体现。新的教育方针规定:“教育必须(1)适应社会进化的需要;(2)发挥平民教育精神;(3)谋个性之发展;(4)注意国民经济力;(5)注意生活教育;(6)是教育易于普及;(7)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sup>[30]</sup>此后不久,各个学校的“体操科”逐渐改为“体育科”,在学校体育课中,田径、球类、游戏等生动活泼的运动方式被融入其中,实现了我国近代学校体育内容和形式的重大历史转变。

我国近代教育史上杰出的教育家陶行知,在实用主义体育思潮影响下,亦主张全面教育,倡导学校教育“三育并重”,而体育与人的发展和国家的兴衰密不可分。在陶行知体育思想中,最突出的是根据中国的国情、民情、社情进行加工后提出了体育的目的论和方法论是民族性这一观点。他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把提高中华民族的健康作为主要宗旨,并从关心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角度,提出了“健康第一”的口号。陶行知对体育一系列的论述与做法,对中国近代体育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与教育家陶行知不同,郝更生作为一位以体育事业为专职的人士,主要从体育本身的角度在中国推广和普及实用主义体育。他终其一生从事体育事业达50年以上,1919年进入美国春田学院留学时,正是美国“新体育”的开展时期,<sup>[31]</sup>也就是由“体操”系统转向“具有教育特质”的“体育”系统时期。留学的经历和中国近代内忧外患政局的影响,也造成他从实用主义角度进行“体育救国”的最大动机。1927年他发表了《十年来我国之体育》一文,陈述了体育教育化的思想,并从硬件设施、体育课程、女子体育、体育师资等方面进行了解析。<sup>[32]</sup>从当时的时局出发,郝更生认为体育作为救国的手段,连举办运动赛会也不例外。作为一位在中国近代体育史上具有相当影响的体育人物,郝更生的体育思想对近代体育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其体育观中体现出的实用主义色彩,显受美国“新体育”思想的影响。

在中国近代体育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之地的自然主义体育思想,是由美国实用主义教育理论派生而来,而且在发展过程中受到美国“新教育”的一定影响。在美国学者威廉士的传播下,20世纪20至40年代成为美国学校体育的主导思想。至“五四”运动前后,麦克乐以其青年基督教会体育专业干事的身份来到中国并带来了自然主义体育。在这一过程中,早期留学美国专习体育后回国的部分学者也对自然主义体育思潮备加推崇,并通过培养学生和著书立说加以传播。

吴蕴瑞,中国体育理论研究的奠基人和中国现代学校体育事业的开拓者。他留美期间就开始广泛系统地传播自然体育思想并逐渐为国人所认识和接受。其“身心一统、德技相长、文理兼修、服务社会”的体育思想,为中国高等学校体育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吴蕴瑞认为体育的本

质目的在于教育人，因而体育应该是教育和文化的一种形式和方法，是学校体育不可或缺的环节。他主张“通过身体的运动来教育人”，“体育是以身体大肌肉活动和适应环境为工具，而谋达到教育目的的一种教育”。<sup>[33]</sup>为此，吴蕴瑞非常注重推崇自然活动，提倡“吾们要藉团体运动的机会去练习舍己为人、因公忘私的习惯”。<sup>[34]</sup>这种建立在身心一元基础上的“身心一统”思想，正是自然主义体育思想在其体育观中的充分体现。

同为体育家和教育家袁敦礼，亦在留美期间奠定了其以自然主义体育思想为基础的体育观。他最早向我国体育界译著了《奥林匹克》一书，并与吴蕴瑞合著有《体育原理》一书，对体育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书中谈到：“体育之意义无论为‘身体之教育’或‘从身体活动中施教’，与身心两方面均有密切关系”。“体育放活动表面上言之不得不谓之身体之活动，但就其意义言之，实全部机体之行为也”。<sup>[35]</sup>袁敦礼认为，体育与教育是密不可分的，从教育的对象是人这一点分析，人的身心应该是统一的，所以“盖身体之活动同时即为精神之活动，而所谓精神之活动，无不含有身体之成分也”。<sup>[36]</sup>

受西方自然体育思潮的影响，方万邦认为“体育本身并不是一个目的，而只是一种方法，或是一种工具，尤其可用为达到教育目的的工具”，他把体育的定义界定为“体育是以身体大肌肉活动为工具，而谋达到教育目的的一种教育”。而“体育的目的在于供给精明能干的领袖，优良合理的环境和适宜运动的机会，使个人或团体，在此情形之下，能获得健康的身体、快活的精神和健全的社性的人格”。<sup>[37]</sup>在方万邦把自然体育学派理论引入国内之后的 20 世纪 20~30 年代，随着西方身体文化怒潮般地涌入中华大地，在体育界出现了“洋体育”和“土体育”两大派系之争。为此方万邦认为，提倡洋体育者忘了中国与西洋在空间上的差异。由于社会制度、理想、风俗、生活和其他背景不同，适合西洋社会的体育当然也不能完全适合中国。盲目采用“洋体育”决不能使中国体育走上新途径，但固执地坚持“土体育”，同样不能使体育走上新途径。为此方万邦提出了“六化主义的体育”，即“教育化的体育”“科学化的体育”“普遍化的体育”“生活化的体育”“自然化的体育”和“游戏化的体育”。<sup>[38]</sup>这里的“六化主义的体育”虽然仍没有超出美国自然体育的范畴，但在理论的探讨上依然还有研究的价值。

自然主义体育思潮的传播，主体影响体现在我国近代学校体育的理论与实践方面。在自然主义体育思潮中，体育是教育的一种形式、是一种生活方式等等主张，既对我国近代学校体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同时亦对体育管理者、体育教育工作者乃至学校学生产生了诸多影响，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国人体育观的变迁，为学校体育教育化、生活化和自然化指导思想的逐步确立奠定了基础。在自然体育思潮影响下，人们对学校体育功能的认识更呈多样化，体育作为教育的一种，其“效果有五方面，即卫生之效果、生理之效果、心理之效果、技能之效果和矫正之效果”。<sup>[39]</sup>从而使人们对学校体育功能的认识更趋多样化。受自然体育思潮的熏陶，在扩大对学校体育功能认识的同时，也促进了学校体育目标的多样化，推动了学校体育理论的进一步研究。

自然主义体育思潮的影响使近代学校体育理论体系渐趋规模化，学校体育理论的论争和研究也趋向活跃。但由于时代的局限，自然主义体育思潮中过分强调学校体育教育功能的观点，造成了把体育混同于一般教育的现象出现，以致部分学校的体育教学目标不明确、效果不明显，甚至出现了如 20 年代至 30 代“放羊式”教学形式主义现象的流行。

### 3.3 国粹主义体育与民族体育思潮影响下的体育观

活跃于 20 世纪之初的中国体育界人士，均经历过中国固有文明、固有道德的深厚熏陶，因而其内心深层的传统文化文化情结是难以脱开的。正因为如此，当西方体育蜂拥而入之际，当中华传统体育受到一定程度冲击之时，维护传统体育“国粹”的那些鼓吹者们，都会由固有传统体育文化观



念和伦理价值中寻觅论据,攻击论敌。尤其是伴随着对西方现代体育了解的深入,伴随着对传统体育文化的维护与反省,以保存传统体育文化为出发点的国粹主义体育观开始出现了。

国粹主义体育观的出现,正值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化、新文化运动以及五四爱国运动如火如荼开展之时。随着现代体育活动相继传入中国,随着对被称为“土体育”的中华传统体育造成的一系列冲击,于20世纪初出现的“土洋体育之争”,成为国粹主义体育思潮展示的主要舞台,而首当其冲的则是被称为“国粹”的中华武术。

在当时掌权的北洋政府支持下,山西陆军学堂教官马良以保留“国粹”为名,编制了一套“中华新武术”。1919年北洋政府“国会”又将“中华新武术”定为学界必学之“中国式体操”。由于北洋政府的用意是通过“中华新武术”来对抗、抵制西方现代体育,因而决议一出即遭到了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力量的抨击。在鲁迅等进步思想家的辛辣讽刺、揭露和抵制下,虽然作为“中国式体操”的“中华新武术”最终未能在学校体育课推行开来,但却引发了一场“土体育”和“洋体育”的论争。

“土洋体育”的论争是以“形式体育”与“实质体育”为题,通过将西方现代体育与传统体育加以比较而展开的。但由于时代的局限,部分论证者既未摆脱传统功利观念的影响,又抹煞了中国传统体育与西方现代体育的差别。以致未能从总体上对“土体育”和“洋体育”进行系统的、深刻的反思。1932年,由于刘长春单人出征洛杉矶奥运会失利的消息传来,使得“土洋体育”之争最终上升到了关于中国体育发展道路的大讨论。

1932年8月7日,《今后之国民体育问题》一文作为社论在天津《大公报》发表。针对刘长春在奥运会上的失利,该文指出:“欧林匹克(即奥林匹克)大会每日之电讯,不知使多少中国学生兴奋欣羨。刘长春,孑然远征,悄然寡趣,中国青年,尤其体育界人,更不知如何感觉寂寞。”“夫欧美日本流行之运动竞赛,究之,乃有闲的国民之游戏事也。其最大妙用,在使青年学生余剩的精力时间,有所寄托,使其兴味集中于运动竞赛,免为政治斗争……故时势至此,西式运动,中国既不暇学,亦不必学,且不可学……请从此脱离洋体育,提倡土体育!中国人请安于作中国人,请自中国文化之丰富遗产中,觅取中国独有的体育之道!”社论甚至呼吁,“中国从此不必再参加欧运会和远东运动会,应舍弃过去模仿西洋之运动竞赛,从此不惟不必参加世界欧林匹克,且应决然脱离远东欧林匹克……请使刘长春为最初的同时为最后的参加欧林匹克者……虽孤立于欧林匹克之外,可以无愧矣”<sup>[40]</sup>。此后,包括《大公报》在内的多家媒体又连续发表多篇社评及中国传统体育的倡导领袖张之江等人的署名文章。<sup>[41]</sup>

但上述“扬土贬洋”的观点却遭到一批曾留学西方学者的反击。谢似颜在《体育周报》以《评大公报七日社论》为题指出:“近代体育的意义,并不限于养生之道与锻炼筋骨,那是增进人类幸福,提高工作的能率,使人格高尚趣味浓厚,并养成适应于文化社会的生活。……对于我们国术一项,当视为含有多少的体育价值,应认有研究之必要。”而对于刘长春在奥运会上的失利,谢似颜认为并不能成为洋体育应该废除、土体育该提倡的理由:“原文(指《今后之国民体育问题》)的旨趣,大概是想到刘长春君的孑然远征,悄然寡趣,就联想到世界的欧林匹克大会的不必参加,又因世界欧林匹克的不必参加,就联想到远东欧林匹克的决然该脱离,于是遂结论到洋体育的应该废除、土体育的该提倡,大有闭门造车,遗世独立之慨。”<sup>[42]</sup>

而发表在《体育周报》上的《体育何分洋土》一文更进一步指出:“所谓洋体育对于身体健康是否有碍,一般人多抱疑虑,近经各国医学家以科学方法之著明,盖已全无疑点。剧烈运动,毫无有碍健康之影响,但须经过相当之训练。至过度之运动,自与身体有碍,百事皆然,何独体育。洋体育之价值约有三点可取之处:1、兴趣浓厚,易劝诱初学者实际参加活动,历久弗衰;2、洋体育多具有

奋斗精神，我萎弱之民族，实需要此刺激剂，如英国之足球，美国之美式足球，均为各该国之国民运动，而不肯轻易放弃者；3、团结合作之精神最为显著，所谓土体育之缺点即在此，国民最需要者亦在此。”<sup>[43]</sup>

由于对传统体育文化的提倡，促使人们开始关注对民族传统体育教学方法的改造和研究。一些武术家在传统武术的教习过程中也开始了对武术教学方法的改造和研究。论证还促使加快了对民族传统体育的挖掘、整理、改造、传承与传播，促使大量民族传统体育成果被挖掘与整理。更促使将现代西方体育的形式融进传统体育运动会，使得现代体育的比赛方法在民族传统体育的比赛获得了借鉴。而值得提及的是，中国传统体育开始走出过门，走进奥运会。如中华武术走进 1936 年柏林奥运会赛场，向世界体坛充分展示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风采。<sup>[44]</sup>

20 世纪 30 年代前后，与国粹主义体育观同样对近代体育产生一定影响的还有一种“民族体育观”。这里的“民族体育”，主旨是指关于民族的体育化问题。<sup>[45]</sup>其核心内容主张在中国实行“全民体育化”和“体育军事化”。实际上，这一思潮的产生与 20 世纪 30 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逐渐升级有关。当时，随着东北、华北的相继沦陷，中华民族已经到了危亡的关键时刻。在此情形下，以著名体育教育家程登科为代表的一批体育界人士，相继在《中国日报》《体育季刊》和《勤奋体育月刊》等刊著文提出了“民族体育”这一观点。力主在中国要“为国家而体育”，要“为民族而体育”。体育应作为“强国强种与复兴民族的工具”。这就是“民族体育思潮”的由来。

在 1912 年到 1945 年间国内局势复杂变化的进程中，于各方实力利用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力量外作为救国、强国手段的同时，教育力量、体育力量的运用亦成为他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sup>[46]</sup>而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民族体育思潮，由于具有军事教育、体育训练和民族文化的特征，因而通过体育训练之手段和民族精神教育，进而达到增强国家力量，消除“东亚病夫”屈辱，理然成为民族体育倡导者的思想精髓。

作为“民族体育观”的提出者，程登科首倡的核心概念之一就是“军事化的体育”。他以“三民主义”“复兴民族”“救亡图存”为军事化体育思想的目标，一切体育的所作所为，完全均要以此目标为导向，而这也是他自创的“民族体育”的基本立场。其所主张的军事化体育的思想和最终的目的，就是普及全民的体育。除了“军事化的体育”，程登科体育思想的第二个核心概念是全民化的体育思想。他为了实现军事化的体育目标，期望“全民皆兵”，人人均能锻炼出矫健的体格，训练成骁勇善战的军人，人人拥有战斗技能、自卫卫国的能力。<sup>[47]</sup>

由上可见，“民族体育”思潮主要是基于发展体育、强国强种的意愿而提出。其有关体育推广应用方面的主张，恰是适应了国贫民弱和抗日救亡的需要。不过，这一思潮受法西斯德国体育的影响至深，带有浓厚的法西斯专制色彩，因此它不可能成为近代中国体育发展的主流意识。

#### 4 国人体育观变迁对中国近代体育发展的历史影响

中国近代体育的发展，主要是沿着两条支线发展起来的。一条是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与演进，一条是近代西方体育的传入与普及，它们共同组成了中国近代体育发展的主体。但这一主体的发展除了体育活动本身，更涉及了与其相关的政治、文化、思想的演进与论争，涉及了现代与传统的论辩。

随着中国近代史上纷繁的政治、军事、思想和文化运动，伴随着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运动、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纷繁登场，与西方文化相伴而至的西方社会思潮，也不断左右着国人体育观的变迁，进而对同时期体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第一，晚清社会变革下的国人体育观，为强兵御侮和强种强国融入体育提供了思想阵地。

1840 年鸦片战争的炮声，惊醒了睡梦中的东方睡狮。在中华民族面临着数千年来从未有过的

“大变局”面前，伴随着“西学东渐”文化的进一步碰撞，伴随着办洋务、求变法、搞改良、闹革命的声浪日起，被视作“蛮夷小技”的西方现代体育也受到了统治阶层、士大夫阶层以及庶民阶层的关注。在西方现代体育不断传入中华大地并得到初步传播的过程中，强兵御侮与体育强兵、强种、强国的思想也开始融入中国人的体育观念之中，体育和国家的前途与命运被紧紧地结合在了一起。

在强兵御侮与体育强兵、强种、强国思想深深嵌入中国人体育观念的过程中，处于由传统向近代转变过程的中国体育，也经历了与西方社会显然不同的近代体育传播路线——先军队，继学校，最后走向社会。因为中国人强兵、强种、强国体育观念的最初形成，主要是来自于洋务派对西洋体操的粗浅认识，因而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洋务派开始编练新式军队，并创办了最早的军事学堂，而以洋操、洋枪、洋炮为主要训练内容的“西洋体操”，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中国新式军队和军事学堂中主要的训练和教学内容。

继洋务运动而起的戊戌维新，是一场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思想启蒙影响着人们观念的变迁，使得人们对促进“西学”包括西方现代体育思想和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有了一种中国式的认可。而由此带来的变化是：军队中的西洋体操被引进了学校教育，人们开始从德育、智育、体育三育并重的角度，讨论人才培养问题，人们开始从更深的层面上接受西方体育和认识西方体育。在人们的体育观念中，体育不仅有军事上的强兵作用，更有在国家与民族长远利益上的强种、强国作用。这就客观上推动了近代西方体育由军队向学校、由学校向社会的传播。

第二，军国民体育的“体育救国”观，推动了体育界尚武风气的形成

晚晴强兵御侮与强兵、强种、强国的体育思潮，由于符合当时中国社会变革的要求，所以被当时的社会先进分子所普遍接受。即使在进入20世纪后，强兵、强种、强国的体育观念，仍然有着极高的社会认同度，以致当时社会刮起了一股强烈的“军国民体育”风潮。虽然军国民主义体育思潮在中国近代体育史上存在的时间不长，但鉴于当时国际形势与国内时局，军国民体育思潮在近代国人的体育观念和体育发展方面还是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如从“体育救国”的角度出发，将“尚武”宗旨列入学校体育教育，提振了时人爱国信念，振奋了人心。同时从“体育救国”的角度出发，推进了中国固有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为保存和传承中华传统体育文化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军国民体育的实施与人们“体育救国”的愿望，在当时仅仅是一种美好的理想。它在推动体育界尚武风气形成的同时，其倡导的教育方式也对学生身心的带来了一定的摧残。所以从新文化运动开始，军国民教育思潮逐渐退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

第三，融健身、娱乐、竞技一体的体育观，使人们真正走入体育

从1915年开始，以军国民体育为标志的强兵、强种、强国体育观念开始受到挑战，在不断举办的西式运动会和教会学校体育活动的双重影响下，近代国人的体育观逐渐由强兵、强种、强国向健身、娱乐、竞技的方向转变，而由此带来的是人们更加认真地去思考体育的本质、更加认真地去定义体育和认识体育。

随着民主和科学思潮的传播和封建伦理道德对知识分子束缚的逐渐解除，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大大激发了知识分子的个人意识，促使他们开始从资产阶级的人本主义和民主、自由的观点去探讨体育问题。与此同时，外敌对中华民族的虎视眈眈这一似乎与科学发展毫无关系的问题也恰恰在此时凸现出来，客观地鞭策着人们用更科学、更理性的态度去思考学校体育问题。因此，改变现有的学校体育教学形式，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而就在这一过程中，于在官办学校体育课堂教学中仍坚持以规定的普通体操和兵式体操教学内容为主的同时，部分官办学校开始在学校课外体育活动中提倡和开展现代田径、球类等运动项目。这种被学术界称为“双轨制”的出现，标志着人们对体育认识开始发生了一定的变化。1923年，在北京政府公布的《课

程纲要草案》中已经正式将原有学校的“体操科”改名为学校“体育课”。从此，以田径、球类和游戏为主要形式的西方现代体育内容，逐渐扩大到我国的整个学校教育中，并得到了普遍实施。特别是随着实用主义体育和自然体育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为融健身、娱乐和竞技为一体的体育观念的最后形成奠定了基础。人们开始真正地走入体育，而这一近代体育的主流认识，一直持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

### 参考文献：

- [1] 陈天华. 劝同乡父老遣子弟航洋游学书 [M] // 游学译编: 第 6 期.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77.
- [2] 曾国藩. 致宋滋九 [M] // 曾文正公全集·批牍: 卷十三. 北京: 中国书店出版社, 2011.
- [3] 朱来常. 淮军始末 [M]. 合肥: 黄山书社, 1984: 21.
- [4] 夏东元. 洋务运动史 [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 40.
- [5] 舒新城.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 上册 [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1.
- [6] 王恩溥. 谈谈六十三年前的体育活动 [M] // 中国体育史参考资料: 第三辑. 北京: 人民体育出版社, 1958: 121.
- [7] 朱有骥.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 第一辑上 [M].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529.
- [8] 张之洞. 札学务处发学堂歌、军歌 [M] // 张之洞全集: 第六卷.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8: 4258.
- [9] 梁启超. 康有为传 [M] // 康有为. 康南海自编年谱 (外二种). 北京: 中华书局, 1992: 244.
- [10] 梁启超. 学校总论 [M] // 引冰室文集点校.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1: 40、50.
- [11] 梁启超. 学校总论 [M] // 引冰室文集点校.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1: 40.
- [12] 欧榭甲. 论政变为中国不亡之关系 [G]. 清义报: 第 27 册: 1899-09-15.
- [13] 庄扬丰. 国难期的军国民教育 [J]. 正中月刊, 1936 (3): 1-5.
- [14] 范源濂. 今日世界大战中之我国教育 [M] // 舒新城.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下.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61: 1053.
- [15] 范源濂. 今日世界大战中之我国教育 [M] // 舒新城.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下.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61: 1055.
- [16] 徐一冰. 整顿全国学校体育上教育部文 [M] // 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 中国近代体育文选. 北京: 人民体育出版社, 1992: 25.
- [17] 徐一冰. 二十年来体操谈 [M] // 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 中国近代体育文选. 北京: 人民体育出版社, 1992: 78.
- [18] 徐一冰. 整顿全国学校体育上教育部文 [M] // 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 中国近代体育文选. 北京: 人民体育出版社, 1992: 23-25.
- [19] 程传银, 邹兰. 纵论我国近现代主要体育教学指导思想及其历史影响 [J]. 南京体育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0, 24 (3): 15-18.
- [20] 王殿贤. 现阶段之中国体育 [N]. 勤奋体育月报, 1937 (3).
- [21] 程传银, 邹兰. 纵论我国近现代主要体育教学指导思想及其历史影响 [J]. 南京体育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0, 24 (3): 15-18.
- [22] 陈独秀. 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 [J]. 新青年, 1919 (6): 1.
- [23] 陈独秀. 新教育是什么样 [M] // 感谢美, 等. 陈独秀教育论著选.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5: 289.
- [24] 陈独秀. 新教育是什么样 [M] // 感谢美, 等. 陈独秀教育论著选.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5: 289.
- [25] 李大钊. 五一纪念日对于现在中国劳动节界的意见 [N]. 晨报副刊, 1922-05-01.

- [26] 二十八画生. 体育之研究[J]. 新青年, 1917(3):2.
- [27] 恽代英. 学校体育之研究[J]. 青年进步, 1917(4).
- [28] 麦克乐. 五十年来中国之体育及武术[M] // 最近之五十年——申报馆五十周年纪念. 上海书店影印出版社, 1987.3.
- [29] 周新国. 张謇的教育思想与实践[J]. 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19(3): 25.
- [30] 王丽. 温故壬戌学制. 中国青年报[N]. 北京, 2009-01-21.
- [31] 王建台. 西方自然体育思想形成之历史背景及其在中国推展之反思[J]. 体育学报, 1994(18).
- [32] 郝更生. 十年来我国的体育[J]. 体育季刊, 1927(1):2.
- [33] 吴蕴瑞, 袁敦礼. 体育原理[M]. 上海: 勤奋书局, 1933:10.
- [34] 吴文忠. 体育史[M]. 中国台北: 正中书局, 1995: 64-65.
- [35] 吴蕴瑞, 袁敦礼. 体育原理[M]. 上海: 勤奋书局, 1933:62-63.
- [36] 袁敦礼. 心身关系与体育[J]. 体育季刊. 1933, (1): 1-7.
- [37] 方万邦. 体育原理[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3:213.
- [38] 方万邦. 体育原理[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3:227-236.
- [39] 王学政. 体育与教育[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45:41.
- [40] 社论. 今后之国民体育问题[N]. 大公报, 1932-08-07.
- [41] 张之江. 致天津大公报社函[N]. 大公报, 1932-08-13.
- [42] 谢似颜. 评大公报七日社论[N]. 体育周报, 1932,(1):30.
- [43] 社论. 体育何分洋土[J]. 体育周报, 1932,(1): 28.
- [44] 张文广. 辛酸的回忆——第十一届奥运会之行[J]. 体育史料:第二辑, 1980,(8).
- 刘玉华. 忆第十一届奥运会中国武术队赴欧表演[J]. 体育史料:第二辑, 1980,(8).
- 郑光路. 中国武术走向世界的序曲——国术表演队一九三六年赴“奥运会”[J]. 体育文化导刊, 2004,(7): 63-67.
- [45] 何启君, 胡晓风. 中国近代体育史[M]. 北京: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 1989:320; 崔乐泉. 中国近代体育史话[M]. 北京:中华书局, 1998:138.
- [46] 许义雄.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体育思想之形成[J]. 体育学报, 1987,(9):6.
- [47] 潘卫成, 齐红梅, 周景晖. 程登科体育思想分析[J]. 体育文化导刊, 2014,(12):158-160.

## Study on the Change of Chinese Modern Sports View Under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Thought

CUI Le-quan

(Sports Culture Development Center of the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Sport China, Beijing 10061 China)

**Abstract :** This paper uses the method of documentation and materials to analyze the change of Chinese modern sports view under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thought. The paper contents that after The Opium War( 1840 ), with the rise of self-strengthening movement, WU Xu reform movement, Xinhai Revolution and New Culture Movement, with the exchange of the earth ideas and the ocean ideas in the 1920s-1930s, and with western social thoughts coming, the western sport had the deep impact on the Chinese sports view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late Qing period, the thoughts of Strong military forces, to resist the invasion, strong the people and strong the nation drove Chinese to start exploring the path of sports saving. And sports

(下转第82页)